◎ 第一部分

歷史視角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

（寒竹　文揚）

JPC
HK

中國的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在中國，都是晚近的事物，理論上的歷史未超過 100 年，實踐上的歷史才 70 年左右，而現在所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只有 40 年左右。若放在 5000 多年中華歷史的長度上衡量，只是百分之一二，相互之間的關係，不可能是割裂分立的，必然是傳承發展的。

正所謂存在決定意識。中國的社會制度作為一種上層建築，追根溯源，是由支撐著“中國”這一國家政治意識的兩個巨大的客觀存在所決定的。

第一個巨大存在是中華民族繁衍生息所依託的以中原為中心並向四周延展的、很早就被認為是“天下”的、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第二個巨大存在是中華民族獨自創造出來的、綿延 5000 年不曾中斷、生生不息蓬勃發展直到今天獨特的中華歷史文化。這兩個巨大的客觀存在都屬於天然存在，它們在最大的程度上決定了中華民族的各種上層建築——歷史上不同的政治組織形式，乃至今天的社會制度。

而由於這兩個天然存在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中國的社會制度在本質上也是獨一無二的，與來自西方的各種社會制度之間，也許會有“暗合”的關係，或“殊路同歸”的關係，但絕無源流和繼承的關係。

習近平總書記在 2013 年 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 30 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0 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 170 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 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1] 這是一個正確的、科學的表述。

5000 多年的悠久文明不僅獨一無二，而且完整統一，無法割斷，無法分拆。在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內乃至整個東亞地區，說到國家，就必定要從夏朝說起；說到皇帝稱號，就必定要從秦始皇說起；說到年號紀年，就必定要從漢武帝說起，這個特殊紀年不僅比公元紀年早一百多年，而且在史書上一年不缺地一直排到宣統三年……

還有曆法、文字、習俗、典章、器物、觀念、精神等，世界上再找不到第二個如此悠久、連續、完整、同一的巨型文明。

首先看清楚這個現實，再來探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之處和優越之處，很多問題就比較容易得到解答了。實際上，

正是中國獨特的國家起源、獨特的政治文化、獨特的經濟形態決定了中國獨特的社會制度。而這一切都與中華古文明時期直接相關。為了厘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中華文明之間的關係，我們先來看看作為舶來品的社會主義思潮，在西方是如何萌生的。

（文揚）

一、西方近代社會主義思想

社會主義在西方的萌芽

西歐地區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並沒有大型的農耕定居文明，除了伊比利亞半島和法蘭西等地有一些面積較大的農耕地區，大部分地區都是非定居文明。在公元 5 世紀羅馬帝國解體後，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日耳曼部落長時期被稱為“蠻族”。

與中國北方草原帝國與中原帝國之間的共生共存關係類似，西北歐蠻族部落的文明發展，也主要是通過對南方和東方地中海定居文明的劫掠和侵佔，如羅馬帝國末期的蠻族入侵以

及 11 世紀至 13 世紀的十字軍東征。

而到了大航海時代，則發展出更大範圍的征服活動，包括對整個美洲和非洲的劫掠和侵佔。因此，其基本性質就是一種“遊盜文明”。

產自西歐地區的社會主義，在概念誕生之初，含義很確切，並不混亂。恩格斯說過：“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的運動，而共產主義則是工人階級的運動。”[2]

在 19 世紀中期的西歐，這個描述符合現實。在工人階級作為一個“自為”的階級崛起並建立了自己的國家之前，世界的圖景是這樣的：近現代歷史的西方源頭，就是 16—19 世紀 300 年間發生在西歐的社會巨變；而這個巨變的核心部分，就是一個新的人群——出現在城市當中的、非貴族出身的、需要自謀生路的、主要依賴於智力勞動的、憑金錢獲得權力和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崛起。

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歸根結底不過是這個新興階級為了說明自身或調適自身而製造出來的不同理論。

最早的使用者，如歐文主義者和聖西門主義者們，主要用“社會主義”這個概念表達他們不滿資本主義社會中盛行的個人主義而期望實現集體主義理想，如法國聖西門派的戎西埃

雷在 1832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到，“我們不願意為社會主義而犧牲個人，也不願意為個人而犧牲社會主義”。1840 年歐文（Robert Owen）出版了《社會主義與理性社會制度》（*Socialism or the Rational System of Society*）一書，將社會主義制度作為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修正和改造而正式提了出來。

所以說，關於資本主義的理論，從根本上決定了關於社會主義的理論，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或者說，首先出現的是被資產階級理論家建構出來的關於資本主義的宏大敘事，而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理論，無論是誰創造出來的，也無論處在光譜的哪個位置，其實無不是從這同一棵觀念的“大樹”上生長出來的枝枝葉葉。

而關於資本主義，最簡單粗糙也是最長盛不衰的宏大敘事，就是“自古以來早已存在”論，即認定世界上存在一種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普世理性，人類從原始社會開始就有了“互通有無，以物易物，相互交易”（亞當．斯密）的天性，也就是資本主義的萌芽。此後，人類社會踏上了通向現代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偉大征程，旅途漫長而艱辛，英勇的“資本主義者”們（從巴比倫商人，經佛羅倫薩市民，直到鹿特丹和倫敦的資本家）一路披荊斬棘，移除了所有障礙和藩籬之後，終於抵達

了今天這個光輝的彼岸。

這是關於資本主義最光鮮亮麗的一副面孔，那些血腥殘暴、你死我活、爾虞我詐、敲骨吸髓的相貌都不見了，撒旦魔鬼被打扮成了英雄大衛。

就這樣，關於資本主義的英雄故事，與關於西方文明的光輝道路一起，構成了近代以來“西方中心論”的主線。雖然可以確認，在 16—19 世紀的 300 多年時間裏，西歐地區的確發生了一場獨一無二的社會巨變，但同樣可以確認，這場巨變只發生在西歐所處的遊盜文明當中，屬於特例，與其他類型的文明基本無關，當然不具有普遍意義。之所以後來被嵌入了整個“世界歷史”，被解釋為一個所有文明早晚都要經歷的必然階段，被當作西方文明的先進性和優越性進行理論上的歸納總結並用來指導所有其他文明，無非就是西方取得了全球統治地位之後才應運而生的一個學術工程，旨在使西方的統治合法化、永久化。

人們耳熟能詳的各種解釋理論 —— 理性科學、自由個體、新教倫理、人文主義 ——千方百計使西方世界與其他地方區別開來，並形成了說明為什麼現代資本主義只出現在西方並最終導致了西方的勝出的各種理論。這些理論實際上大都站不

住腳，因為其中有太多偽造歷史和簡化現實的痕跡。

偽造和簡化工作，主要是由 18—19 世紀的日耳曼歷史學家群體完成的。他們通過區別“文明民族”和“野蠻民族”、“演進的歷史”和“靜止的歷史”等貌似科學的概念，有選擇地將古代文明史重新編造成一個連貫的、有利於西歐的“世界歷史”。在這種以歐洲為中心的單線歷史當中，中國和印度一定被排除在世界歷史之外；波斯、阿拉伯、突厥、蒙古，也一定被當作“野蠻文明”被邊緣化、妖魔化；剩下的就是一個從古埃及、古蘇美爾開始，經過了雅典、羅馬、耶路撒冷這個“古典時代”，進入了千年“中世紀”之後，通過佛羅倫薩的“文藝復興”，接著到了近代的宗教改革、工業革命時期，最終來到了現代自由民主這樣一條光輝道路。

完全無視中國和印度，就等於是將人類文明史上最為重要的大型定居文明排除在了歷史敘事之外。利奧波德·馮·蘭克和馬克斯·韋伯等人是“歐洲中心的單線發展史”以及所謂“內在發展的剛性規律”的主要建構者，但由於他們影響巨大，19 世紀的西方社會科學幾乎完全建立在蘭克的“科學史學”和韋伯主義的“西方中心論”的基礎之上。

一百多年裏圍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對錯優劣的各種爭

論，也許根本沒有走出那個被所謂“經典”理論、“經典”觀念堆砌起來的空中樓閣，從來沒觸及真正的社會現實和更廣闊的世界。如果抽離掉“歐洲中心的單線發展史”和“內在發展的剛性規律”等基本假定，認識到這些觀念完全可能是錯覺，是一種只屬於特殊類型文明的特殊情況，那麼關於“一切人類社會的歷史”的各種理論，在今天這個互聯網時代的知識基礎和批判環境下，都會變得面目可疑、漏洞百出。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資產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增加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階級都排擠到後面去。”[3] 這就是當時的時代巨變，就是此後幾百年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爭的源頭。而之所以發生了資產階級突然崛起這個巨變，從西歐的歷史上看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從非洲販賣的奴隸和從美洲掠奪的金銀令西歐權貴階層暴富；二是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刺激了各國精英階層之間的激烈競爭；三是各國公權力的虛弱導致私權力膨脹。

這三個主要原因都有充足的史實作支撐，如果不是受到

“歐洲中心的單線發展史”觀念的強力主導，引出各種牽強附會和東拉西扯——源自古希臘的資本主義萌芽、源自古羅馬的共和主義和私法傳統、源自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和科學理性、源自新教革命的資本主義工作倫理、源自“大憲章”和“普通法”的自由主義文化——本來早應該出現更符合史實、更合乎邏輯、更令人信服的歷史敘述。

實際上，這三個原因沒那麼離奇難解，本質上無非是遊盜文明的特性在那個時期的集中反映：第一條，從非洲販賣的奴隸和從美洲掠奪的金銀，背後是人類歷史上最為野蠻兇殘的集體屠殺和種族滅絕，非遊盜文明不能以此為天經地義並大行其道；第二條，西歐的四分五裂，反映出羅馬帝國覆滅後西歐基督教社會長達千年的低等文明狀態，非遊盜文明不會是如此這般的早期歷史；第三條，公權力的虛弱，體現出該地區國家建設普遍的未完成，甚至尚未達到古代亞述、埃及、巴比倫、波斯等早期文明國家的建設水平，非遊盜文明不能處在如此這般的狀態。

所以，歸根結底還是這個文明自身的特殊性，在大航海時代之後西歐各國資產階級的迅速膨脹，不過就是這個特殊文明在一個特殊時期出現的一段特殊的小歷史：從一個不高的文明